

跨世纪崛起：

上海改革开放30年回顾、总结和展望

汪胜洋 等著

跨世纪崛起：

上海改革开放30年回顾、总结和展望

汪胜洋 等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世纪崛起:上海改革开放 30 年回顾、总结和展望/汪胜洋等著—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642-0412-9/F·0412

I. 跨… II. 汪… III. 改革开放-概况-上海市 IV. D61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7367 号

□ 责任编辑 张小忠

□ 封面设计 钱宇辰

KUA SHIJI JUEQI

跨世纪崛起:

SHANGHAI GAIGE KAIFANG SANSHINIAN HUIGU ZONGJIE HE ZHANWANG

上海改革开放 30 年回顾、总结和展望

汪胜洋等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装订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960mm 1/16 37.5 印张 633 千字

定价:57.00 元

绪 论

改革开放 30 年,上海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重铸了辉煌,焕发出勃勃生机,向世人展示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我们撰写本书,总结过去 30 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为了向这个时代致以敬意;总结 30 年取得的成功经验,是为了指导当下以及更长时期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特别重要的是要将这个时代的伟大精神传承下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继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

在本书截稿之际,我们既有完成工作带来的轻松,也感到有些意犹未尽,还有再讲些什么的冲动。尤其是关于中国特色和上海特点,是我们体会比较深的。由于受体例的限制,总感觉书中有些问题还没有讲透,以下的文字权当本书的一个注释吧。

—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上海孕育改革动力蓄势待发的时期,作为计划经济“示范区”的上海,为即将要到来的改革开放的高潮积蓄力量。相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成就,这个时期上海在改革开放方面的成绩并不突出,但是新事物已经开始不断拥入,人们内心充满对变革的向往,各种思潮涌动,使得许多曾经亲历这个激情澎湃时代的人们对它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情结。

综观历史,上海的改革开放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已经蕴藏着强烈的改革冲动息息相关。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主要有两个亮点——农村改革和特区改革。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短期内释放了巨大的效应,但是对于工业化比重相对较高而且农村集体经济发育相对较好的上海来说,家庭联产承包制本身并没有带来什么惊奇,倒是

在此之后，农村释放大量劳动力，乡镇企业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一方面与上海国有企业争夺原料，一方面又以灵活的经营方式冲击了国有企业的僵化机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制造业一枝独秀局面被打破，农村改革给城市好好上了一课。

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改革试验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框框，带动了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在短期内迅速集聚了大量外部资源，一个小渔村很快就展现出现代化城市的雏形，显示了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而同期的上海却还在国有企业效益下滑和财政困难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这些状况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国际大都市的辉煌和计划经济时期上海作为全国最大城市及制造业中心的荣耀形成巨大的反差，上海憋足了一股劲，伺机寻求突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1985年2月8日国务院批复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为20世纪90年代上海腾飞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上海股份制领域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并且不断探索证券市场建设，有了西康路的柜台交易和“老八股”，1990年证券交易所才会重新在上海开业，引发上海要素市场成功“突围”，奠定了上海要素市场体系健全的今天。

二

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史赋予上海伟大的使命。上海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逐渐从中国改革的后卫走到了前沿，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城市功能加快转型的过程，更是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和长三角城市群加速成型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是上海自身动力释放与国家战略要求以及经济全球化紧密结合的结果。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上海改革开放呈现出与经济全球化同步深化的态势，也成就了一个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范例。

从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经济全球化迅速深化，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正在悄悄改变，其核心内容是产业转移，总体趋势是从发达国家向亚洲转移，而亚洲的中心正在转向中国。在这段时间，中国最活跃的地区从珠三角转向长三角，而长三角的核心在上海。可以讲，上海的崛起已经成为20世纪末全球的焦点和全球化的关键点，上海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以对外开放为核心的浦东开发开放的

改革,成为上海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形成了上海改革开放模式——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模式,通过引入外部增量资源打破原有的平衡,为形成新的平衡,就需要改变现有体制,从而生成改革的需求,逼迫或触发体制变革,所以这种模式下的改革是一种倒逼性改革,是外部资源进入后推动体制变革的模式。倒逼性改革也是一种机遇性改革,相对于危机性改革不得不为的特性而言,倒逼性改革因其不为并不会引发灾难性后果而具有可为也可不为的特征。由于倒逼性改革有助于把开放和发展推向深入,改革者才把它视作一种机遇,倾注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所以也可以说由开放推进的倒逼性改革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性改革。

三

回首改革开放 30 年,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中国人不断融入世界的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总体上还是依靠自力更生,在短期内解决了吃饭问题,尽管当时有特区的试验,但是并没有解决整体发展的问题,离开发达经济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好像从一个低处向上攀爬;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东西方对峙打破,新一轮产业转移开始,信息产业的发展让这一次转移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中国低成本的优势逐渐被世界发现,外部大量的资源拥入,中国人踏着外部拥入的资源逐步崛起。形象一点说,第一阶段可称之为“爬坑”,当时我们仰视发达国家,在坑里竭力向上爬,而人家用带有某种救世主的高傲神态对待我们。第二阶段,情形完全不同了,尽管我们还在“坑”里,还在仰视,但是发达国家将大量的资源带进了“坑”里,不管他们的用意如何,这些资源让我们踩踏的底部垫高了,逐渐逼近了地面,外部资源确实帮到了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已经出了“坑”,这时我们与发达国家开始相互平视,人家看到了一个巨人的雏形。有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诞生,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希望;也有人开始担心,生怕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甚至有人突然联想起历史上的不愉快经历,滋生出痛苦与恐惧来了。

当前,世界上更多的是合作者与竞争者。另外,爬出低“坑”的中国人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闲庭信步了呢?显然不是,对于勤劳的中华民族而言,勇于攀登是我们的性格,永远有更高的海拔等待着我们。

四

21 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们开始与发达经济体合作与竞争时代的到来。面对这样的时代,中国人要做的不仅仅是对外开放了,我们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还要“走出去”,不仅要遵循国际惯例,而且还要影响国际规则,不仅要增加中国元素,为世界多极化做贡献,而且还要贡献中国智慧,构建更加完善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思路面临重大调整,上海构建全球城市就成为了国家战略。

所谓全球城市,就是在全球经济中占有支配地位的节点城市,而国际中心城市是指拥有某些国外成分或国际成分的重要城市,其突出的特点是非本地成分。一个非本地化程度高的城市其国际影响力未必也大,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全球城市强调的是国际影响力,是对国际中心城市的提升。正如英国之有伦敦,美国之有纽约,日本之有东京一样,中国要跻身一流经济大国也需要自己的全球城市。

构建全球城市有利于把中国成功的经验让更多的国家共享,也有利于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加理想的环境。如果中国拥有自己的全球城市,就能够控制和支配世界资源,指挥世界经济,参与世界事务,大大提高我们的行事效率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五

自浦东开发开放始,上海逐步走到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形成了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上海改革开放模式。其许多特点也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主要内容。

上海模式的形成是在中央直接关心、指导和决策下形成的。1990 年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给予浦东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主要关注点是吸引外资。尽管浦东开发开放的初始阶段外资并不多,但是从浦东邀请国际知名机构参与规划,根据国外机构需要不断提高开发区的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以及在陆家嘴地区开发高档楼宇等举措来看,还是把目标盯住了外商投资企业,并且这些载体的打造也逐步成就了外资集聚的效果。从优惠政策的软环境出发,到载体建设的硬环境的配套,中央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上海模式的形成是上海知识界全力参与的成果,理论指导和社会参与的决策咨询成为上海的特色。上海模式因浦东而起,早在 1984 年,上

海的专家学者就对《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的拟订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后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各个阶段,上海的专家学者都适时参与,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上海模式的形成是从实际出发,探索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过程。浦东开发开放从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大力利用外部资源推进区域发展,在“依靠谁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实现了突破。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确立了“发展经济”的主题,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就“依靠谁发展经济”确立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主题。浦东就是一个利用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典范。上海通过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微观市场主体逐渐成型,市场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上海模式的形成是改革开放 30 年,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共同成就,但作为改革的历史性产物,上海模式具有不完善特征,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终极模式,不是完美无缺的,其缺陷成为我们下一步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克服的重点。当前正处在第三次思想解放时期,其间要解决“怎么发展经济”的问题,贯彻科学发展观就成为解决上海模式缺陷的最佳途径。

六

上海的国资国企问题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上海国有资产规模比较大,而且退出的也不多,如今还保持着很大的规模,因而有些人认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滞后,还有人据此批评上海的改革。

事实上这只是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一部分状况,还有重要的部分没有进入“有些人”的“法眼”,即“新国资”——一种转换了功能的新型国有资产。在上海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一种国有资产迅速发展起来,改变了原有的国有资产的组成结构,使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有资产大相径庭。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有资产主要由生产一般竞争性产品的国有企业组成,今天生产特殊产品的国有企业占了很大部分,这些生产特殊产品的国有企业往往以投资公司、开发公司的形式存在,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发展、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基础设施,如城投公司、港务集团公司、机场集团、申通集团(地铁投资公司)、申虹集团(虹桥枢纽开发商)、临港新城开发公司、金桥开发公司、张江开发公司,等等;或者引导社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项目,如创投公司等。它们填补了私人资

本不愿意或者暂时不愿投资而市场又急需的空白,不仅加速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力度,也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正是由于“新国资”的发育,国有资产找到了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位置,找到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接口,找到了国有资本发挥特殊作用的领域,还原了国有资产的本质属性。

当然,新型国有资产的强大尽管给上海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是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量还是很大,对民资的“挤出效应”还是很明显,还有退出的空间。

不仅如此,由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門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让国有资产越做越大就成为其显性业绩。作为出资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門似乎是一个执行部門,其职责是代表政府、代表人民管理好这部分资产,不让其遭受损失,甚至是经营好这部分资产,让它保值增值。这是在国有资产既定量的前提下进行工作的,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目标就可能会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門的职责或利益存在冲突,据此分析,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职责就应该由超越国有资产管理职能部門的来承担,而不能完全依赖国有资产管理部門了。

七

全国布局的综合配套改革从浦东开始,具有新一轮改革的特征。

第一,发展与开放倒逼改革的特征没有改变。当前改革的动力不足,需要外部给予新的压力,压力来自发展,压力来自开放。综合配套改革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试验,而是围绕发展和开放这两个重要环节,引入开放和发展元素,打破原有的平衡,通过改革达到新的平衡。阻止达成新平衡的部分,显然就成为发展和开放的瓶颈,都需要以改革来进行突破。因此,综合配套改革本质上是发展和开放,通过发展和开放来倒逼改革,让改革的需求在发展、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明确,在操作阶段不断深化。这也决定了这类改革与发展 and 开放成正相关关系,发展和开放越是深入,改革也越深入,成果也就越大,进而,改革激发更大的发展和更深层次的开放,形成良性的互相促进的局面。

第二,“地方综合”与“中央配套”的特征。自2005年6月浦东批准成为全国第一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以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名称一直受到“非议”。单从语义的角度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诠释,一些

人认为综合配套改革的意思不清晰,综合和配套之间存在同义反复。我们从这项改革的操作过程来看,认为其显示出“综合”与“配套”的不同含义。“综合”指的是改革由多项相互关联的内容组成,注重不同领域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配套”指的是政策,改革要突破现有的体制框架就需要政策配套,以往改革政策由中央一揽子下达,而当前的改革政策却是在改革过程中来进行配套,突出了配套的重要性。因而,综合配套改革的内容由拥有先行先试权的地方政府主导,而政策来自中央,配套权主要在中央。

第三,项目化条件下的先试先行。由于存在“地方主导综合”与“中央配套政策”的本质特征,政策建立在地方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只有在地方先行先试过程中需要的政策,中央才有可能给予配套。也就是说,改革的推进必须要以比较完善的具体方案为前提,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出精细化项目实施方案,才能明确所需的配套政策,才能够让中央评价政策配套的必要性 with 推进的可行性,最终获得中央的政策配套。

第四,国家部委直接推动特征。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改革时期,中央给予地方的政策往往是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并直接移植过来,中央稍加修改就可以赋予地方试行,如企业所得税政策,进出口减免税以及保税区政策等;而进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阶段,情况大为改变,我们面临的许多情况与国外大不相同,中国自身特色日益鲜明,就算有些领域国外已经有了成熟的做法,有时也很难“拿来”直接就用,如土地制度改革等。同时,作为中央集权制政府体制,地方的创新需要中央的认可才能有效,才有可能通过修改现行的规定或给予特许使地方的改革得到支持。因而,中央具体领域的主管部门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只有当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定地方对该项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才有可能支持并予以推动。

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要顺利推进,取得重大突破,一定要以更大程度的开放和更高要求的发展作为基础,一定要构建强有力的推进机构以提高编制精细化项目实施方案的能力,一定要积极谋求并直接获取中央部委的支持。

八

改革开放 30 年来,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入,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过程应该说是一个整体改革的过程,其中应当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进步。没有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不

退出大部分的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很难建立起来，但是，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前期改革中，政府部门自身的改革还是有些滞后。当前社会各界都把下一轮改革的重点指向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种趋势和共识的形成已经有一段时间，然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却依然不尽如人意，社会各界对此反响不断。

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重要地位，投入大量的精力，效果并不明显。从理念上分析，今天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有加强“公共管理”的任务，又有增强“公共服务”的需求，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在理论指导层面带来了一些混乱。从实践来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即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最终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如何达到这一步呢？从现有的改革情况来，路径还没有找到。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本质上的变化，需要政府在结构上作出变化，通过结构的变化改变政府组成人员的行为方式，从而达到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总结国外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路径，即通过发展政府的代理机构和执行机构，逐步缩小审批部门规模，减少政府内部自我循环部分，把主要的力量增加到直接服务民众的部门。

当前各地纷纷发展的招商中心、市民办事中心等，已经向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类“中心”类的服务机构，并且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健全服务机构结合起来，一要不断整合政府内部办事流程，将传统政府机构为中心的行政流程，向以服务中心为核心转变；二要推动传统部门工作人员向各类服务中心转移，在公务员人数总体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不断扩大服务中心规模；三要根据不同服务中心的类别，确立其地位——或是替代原有的政府机构，或是通过分开决策和执行，部分替代传统政府部门，或是将中心改造为法定机构从而赋予其法定职权。

中心类机构逐步替代传统机构到一定量，就会发生质变，政府的运行模式、管理权限、管理方式、服务内容以及人员机构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公共服务型政府雏形就出现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当前的要点就是要发展各种各样的服务企业、服务民众的机构，从发展服务机构入手，打通服务机构与传统政府部门之间的转换通道，不断实现相互间的替换，政府职能就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转变，最终实现公共服务政府的目标。

当前金融海啸强劲,令人感受到严冬的寒意,一批中小企业停产倒闭。为此,专家纷纷开出了药方——自主创新。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没有创新,企业就只能生产附加值很低的产品,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赚取微薄的加工费,抗风险能力弱。目前的情况也证实了这样的观点,金融危机对科技型企业或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影响不是很大,受到冲击的主要是那些加工型企业。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甚至大型企业也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呢?看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企业缺乏创新意识,而要从更深的层次来剖析。

我们知道自主创新是一件难事,一个企业和一个个人在创新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有些困难是企业和个人自身难以克服的,企业会因此遭受损失,或无功而返,甚至倒闭。自主创新又是一条产业链,在共性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同时需要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氛围和支持创新的环境,这不是一个企业能做到的。

关于共性技术问题,我们发现近年来应用型研究院所进入大企业集团的做法,从出发点来看是好的,是为了塑造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体系,但是大企业集团和应用型研究院所难以对接,结果却使得原有的共性技术研究力量弱化了,缺乏共性技术平台,企业单个主体推进自主创新的难度提高了很多,门槛高了,突破更是遥遥无期,而且当前国际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很多成熟的技术企业无法了解,更不要说走到别人的前面了,所以当务之急不是催促企业如何创新,而是政府首先要为企业补上共性技术的课程,并且为企业培育能够以共性技术为基础深入进行研发的人才,这样产学研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这方面,韩国有成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韩国为留住人才,创设了韩国高级科学技术研究院(KAIST),邀请在国外的韩国裔知名科学家回国任教,以国际尖端技术为课程,以企业工程师为招收对象,一方面传输共性技术,一方面为企业培育技术研发人才。KAIST由美国硅谷之父设计,由韩国政府和大企业公同举办,迅速突破了企业创新的瓶颈,为韩国30年后在科技领域获得举世瞩目成就奠定了基础。KAIST,我称之为“产业大学”,是一种产学研结合的新形式,也是自主创新的基础工程。

为应对金融海啸的影响,政府提出了数额庞大的投资计划,但应该搞清楚哪里最值得投钱,哪里投入最有效,最少后遗症,最有后劲。我认为,

支持科技创新,创建“产业大学”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原来政府对这种长期性项目缺乏长期资金的支持,今天在应对金融风暴之时,在4万亿投资中,“产业大学”之类的长期性项目应该可以分得杯中之羹了。

十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在许多经济学家的总结中,有一条很突出,那就是“县域竞争”。所谓县域竞争就是指基层政府之间的竞争,如同早期的欧洲城邦制诸侯为争夺自由民,相互之间展开制度竞争,用更开明的政策争夺更多的纳税人。我们的基层政府争夺更多的是外资,后来也包括内资。基层政府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推动了体制创新,不断完善了体制机制,使得地方经济运行的环境越来越好,最后形成资本和环境之间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

从上海内部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体制,实施市区政府分权,极大调动了区县政府的积极性,有人形象地比喻上海多了“十个小市长”。从上海外部来看,在江浙两边政府创新的压力下,上海也确实丝毫怠慢不得。但是,区县政府之间却存在相互直接争夺税源的过度竞争现象。

上海有的区县已经提出,要制止相互间的税源争夺,而向改善服务和环境打造转变。我们认为,这里的环境应该要从更加广义的概念来看,应当包括地区战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大不相同。经过观察和总结,我们认为地区发展战略有高中低三种选择,如果战略高人一筹,不愁资本吸引不来,关键是看政府制定规划的能力,政府对区域本身认识和定位的深度和高度。

当前上海,尤其是中心城区正处在加快发展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如何吸纳发展现代服务业,政府有不同的战略。第一种方式是载体打造战略,即打造服务业发展的载体,通过建造办公楼宇,改造工业厂房,创设服务业集聚区、创业产业园区或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方法,满足企业发展服务业对场地的需求,同时配套相关的服务,简化审批手续等。看得出这种发展方式比较被动,类似于工业开发区。

第二种方式是推动文化引导战略,主要是通过周边环境的打造,形成某一种主题概念,提升当地的文化品位,进而提高地区的品位。有了文化的基础,周边建筑载体打造就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投资人也就敢于建设较原来更高档次的楼宇。有了文化基础,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大公司大

机构也更愿意选择这些地方以显示自己的品位。政府通过实施文化带动战略,不是被动地满足企业的场地需求,而是引导一种概念来体现企业的价值。

第三种方式是实施市级战略,甚至国家战略,依靠上级政府更大的资源集聚能力来推进本地的发展,借力发展。纳入国家战略或上一级政府的发展战略,在现有体制下,企业就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得到更多盈利的可能。如果第一种方式是为企业获取利润打基础,第二种方式还能够为企业提升形象,第三种方式则直接提供企业盈利机会。由此,为企业发展创造环境,现在看来与地区发展战略直接相关。我们需要区县政府在战略层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改善企业的发展环境,把县域竞争提高到新的层面。

十一

全球城市支配全球资源的重要法宝之一就是要素市场。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接触要比外国人晚些,但是中国人对市场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更偏好于有形市场。第一是认为“大凡是存在大批的买者和卖者的交易,都有可能设立有形市场”,所以各类市场层出不穷,如产权市场、小商品市场,技术市场,等等。第二,“凡是市场几乎都要规模化、数字化、网络化和国际化”,所以在国外不被人看重的小商品市场,在中国做出了大世面,可以说国际化了;技术市场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要以中国为样板建立全球性的市场(2008年11月,全球技术交易所已经在上海揭牌)。第三,“市场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需要形成高度集聚”,为此,浦东集聚了众多的要素市场,使上海成为全球要素市场最集聚的城市,不经意间也形成了上海建设国际中心城市的竞争优势。

中国人在有形市场方面的成功有其背后的原因。中国社会经过计划经济体制之后,经济主体只有国家而没有个人了,国家信用十分强大,而个人信用不被看重,因而在市场经济初期社会信用不振。为推动交易,政府设立了许多市场,主要是利用政府信用或组织的信用来替代企业信用或个人信用,促进市场交易行为顺利进行。市场发展快了,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并逐步替代政府指挥经济的功能,市场经济便渐渐发展起来。人们开始认识到有形市场对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更坚定了发展市场的决心,市场在集聚资源方面有时显得比政府更有效,并且成为基层政府发展经济、参与地区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各类市场蓬勃发展起来,成

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大壮举。

随着各类有形市场的建设,集中交易带来的低运行成本、大交易信息和高成功率,反过来又开始促进了市场的进一步扩张和升级,本地市场向区域市场、国际市场转化,实体市场向网络市场延伸,并且单项突进网络市场等。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各类市场,并以有形市场为主要载体替代政府,降低成本,拓展规模,扩大影响范围,融入全球化的市场高速发育模式,我们称之为“中国式市场”。

“中国式市场”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实践活动与经济学理论结合后创新的产物,也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赋予机遇发展起来的,应该可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以全球城市为目标的上海,大力发展“中国式市场”,也是创造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十二

中国改革开放下一步往哪里走,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思路逐渐清晰了,就是围绕科学发展实施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手段,发展——科学发展才是目标,“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改革不能囿于自己理想的框架,改革要结合发展的实际,为科学发展提供动力、破解难题、创造条件。

当前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核心问题还是要解决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从全国来看,核心是形成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推进的格局,关键是消费问题,农村消费主要依靠提高农民收入,而提高农民收入就涉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开发体制改革等;启动城市消费,就需要改革社会保障体制中个人付费比重过高的问题,从而引导当期消费。从上海来看,核心是进一步提高全球化水平。上海不仅仅是简单地增加国际成分,也不是一味地强调企业到外部投资,上海作为一个城市要“走出去”,就需要使自己成为全球性的城市,使自己的城市功能具有全球辐射能力,通过要素市场、资源市场、商品市场、信息市场等,控制、支配全球资源。对于这样一个目标,改革只是走完了“第一步”而已。

当然,这样的目标对国家战略的意义更大些,可以认为是第二次“浦东开发”。也正因为此,上海需要加强和国家层面的沟通,并寻求中央的进一步支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落实国家战略发展的意图。

回顾 30 年的路程,我们发现有许多“很中国”的东西:“中国式市场”、“县域竞争”、“新国资”、“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等,这些中国特色,历史证明是有效的、成功的,并且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优势。沿用别人的老套路是无法实现赶超的,另辟蹊径倒可能出奇制胜,所以,坚持中国特色,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实实在在的优势和竞争力。

中国,更自信点,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自身特色不动摇!

汪胜洋

2008 年 11 月 26 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篇 上海的崛起	1
上海改革开放 30 年回顾、总结与展望.....	1
一、上海改革开放 30 年的重大成就.....	2
二、上海改革开放模式的形成和特点	8
三、上海 30 年改革的基本进程	16
四、上海 30 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21
五、上海改革开放面临新的时代机遇和挑战.....	28
六、新一轮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	31
七、新一轮上海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	34
第二篇 崛起的支撑.....	42
上海改革开放 30 年国资国企改革的回顾、总结和展望	42
一、改革开放 30 年的国资国企成为上海崛起的重要支撑	43
二、上海国资国企改革 30 年的伟大成就和作用	46
三、上海国资国企改革 30 年的背景分析	52
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 30 年的伟大历程	56
五、上海国资国企改革 30 年的重要经验.....	103